

十、战略战术

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正如母子一样，战术依存于战略，又随战略所指示的方针而行动，战术的行动可以影响战略的成败，而正确的战略却常能给予战术致胜的基础。至于战略战术的定义，几乎每一个兵家都有他的界说，萧米尼说：「战略系在地图上作战，对战争全局打算的方术；战术系在战场上直接指挥部队的方术。」克劳塞维慈说：「战术为一战鬪间使用战鬪力的学术，战略为使用多数战鬪以达到战争目的的学术。」毛奇说：「战略系在地图上运用理想，决定方针，统率全军以行作战的方术；战术系在实地的战场，指挥一部份军队，以行作战的方式。」哥尔兹说：「战略系指挥全军之术，战术系指挥部份军队之术。」这都足供我们对于战略战术意义的了解。以下我且来研究国父的战略战术。

现在我们根据国父的言行来研究他的战略战术，可以说他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是攻势，即「战略攻势」，在对外的革命战争上所主张的是守势，即「战略守势」，至于战术则以采取攻击为主，我且先论他的战略。

一、战略方面

国父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法，像民元以前的进攻满清，是一种奇袭式的攻击，亦可称为游击战。（详见本书「绪言」）民元的兴师北伐，是采取战略攻势，民十一、十三的两次北伐以及历次的讨贼军事，也是采取战略攻势，即以精神力比敌处于优势的革命军（然人数武器比敌处于劣势），作连续的进攻，求敌而歼灭之。西方兵家说：「虽说数目上的优势，为任何企图胜利者所不容忽视的原则，但数目较少的一方，仍有进攻并击败敌人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优势之所在，或为指挥人力物力较少者之智力，或为将士用命。」（志一）可作为国父这个战法的注脚。见于遗教上有：

一、民元布告全国同胞书说：「凡我各省军民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神而速，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

二、民四发表讨袁宣言说：「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划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三军既兴，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护法之役电襄阳黎联军总司令暨全体将领说：「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势，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若复东取武汉，断敌归路，而西南大兵，奋击于前，更使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恶未尽，以致奸人迭出，变乱频仍，今兹务定正本清源之策，为一劳永逸之计。」

四、民十一讨陈电覆陈护黄说：「分路进兵，以期破贼。」

五、民十三关于讨陈及北伐致蒋中正先生的信，其一说：「望兄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则川湘各军必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否则不论奉直谁胜，西南必亡。际此之时，能进则存，不进则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说：「江西得救，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会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于此可见国父是采取拿破仑「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此外，他亦采取我国古代兵法所谓「先发制人」的原则，因为欲采取攻势，其动作必须先发制人，争取战争最初的胜利，由最初的胜利，而发展为整个的胜利。他说：「余倡议讨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发制人，致遭失败。」（「孙文学说」第六章）又见陈英士致黄克强的信说：「中山先生在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发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行动极称自由，我惟有出其不易，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已确鉴，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战略攻势的采取，并不限于革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为完成他的革命目的，亦须采取攻势。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闪击欧陆各国是采取攻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亦是采取攻势。因此，他们都是先发制人，施以猛烈的闪击。于此我再要引申的，攻势与守势，并不是极端对立的，虽说「较强的一方恒采取攻势，较弱的一方恒采取守势」，但在某种情形之下，攻势可转为守势，守势也可转为攻势。不过在攻击的一方未达目的而转为守势时，却会给予守势的一方以反攻机会。守势的一方，为力求保全自己人力物力，和对方实力在攻击中消耗之后，终获决战的机会，而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我们可以

说，攻势固可以取得胜利，守势也可以取得胜利，正如毛奇所说：攻势是「到达目标的直路」，守势则是「兜着很大的圈子」。

其次，关于对外抗战的战略，国父基于当时的情势是主张取守取势的，亦即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因为敌人来侵，施行攻势作战，利在包围歼灭，速战速决，而我因军力比敌劣势，自然要施行守势作战以制之。但国父所谓「守」，决不是绝对的「守」，永远的「守」，是以反攻为最后目标的「守」，克劳塞维慈说：「凡自信是寡弱的，不得不先处守势，但守势的结果，不可归于消极。若守者之力已渐大，则常转变为积极目的，速把守势弃掉，一至抵抗到相当程度，即自然须变为攻势。所以守势作战是循自然之进行，必始于守势而终于攻势。若因最初处于守势环境而限于一般被动的抵抗，始终不行攻势运动，这是不合理的。若不问事态如何，始终墨守守势，决不转为攻势的，那是更不合理。因为守者专靠站在原来的地位来打退敌人而不转为攻势的军事行动，是和以绝对被动的守势思想来行会战一样的不合道理。」国父的主张正和克氏相同，即先取守势，俾取得充分的准备，养其全锋，俟敌疲惫，然后乘机大举反攻。当民初帝俄侵略我外蒙古日急，国父主张对俄抗战，意谓在战略上应先采取守势，即所谓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俟第五年练兵八百万至千万，然后转为攻势，直抵莫斯科、圣彼德堡。详见「钱币革命通电」。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在战略上就是采取守势，一俟时机成熟，当转为攻势，反攻大陆，与诸民主国家会师莫斯科。

此外，还应特别举出的，国父在战略上（或用兵方略）有两项较具体（并带有弹性）的指示：其一是：「此后战略宜大变更，集中全力速趋省城为上策，集中全力以扑灭麻子为中策，缩短战线，以保势力，而待援军亦为一策。惟不忍舍去土地，与敌相持，分薄兵力则为下策。望兄速酌施行！」（覆陈某告战略三种电）其二是：「竞存不日动，各宜先后继起。舰队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门，与附近各营同时起事。并令少部队与数小舰进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断其交通之路。以大队水陆并进，取香山顺德握而守之，以容奇为舰队根据，以大良为部队大营，以甘竹勒楼黄连紫坭菜蕉门中一带之水为防线，水陆军握而守之，为持久计。此防布置妥当，即分兵进取虎门东莞石龙一带为右翼，以绝彼东江之交通。然后分东西路水陆夹攻：西路取道官窑石门，水路以攻石井，东路取道广九铁路，进攻长州牛山各炮台。得手进攻河南花地，与西路联络，而包围佛山陈村敌军，尽缴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

此作战方略之大要也。务望与舰队同志谨识而执行之！」（「再致李绮庵指示作战方略电」）于此亦可见国父确是一个大战略家。

二、战术方面

克劳塞维慈说：「战争唯一手段，无论为攻势，为守势，而决定战鬪者，厥在战术。所以一切战略计划，皆以战术之成果为目的者，盖以战术之成果，为胜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帅说：「战略自体不能存在，须赖战术，始能发挥其价值。」战术之重要，于此可见。在这里，我们首先应知道国父关于战术的论述：第一、关于战术的发生：国父认为它是发生于战鬪的事实。他说：「现在的军人都是说入学校，研究战术学，学成了之后，为国家去战鬪。照这种心理来讲，当然是先有言论，然后才有事实。但是照世界进化情形说，最初人同兽鬪，有了几百年，然后那些毒蛇猛兽才消灭。在那个时候，人同兽鬪，到底有没有战术呢？当时或者有战术，不过因为没有文字去记载，便无可稽考，也未可知。后来人同人相争，国同国相争，有了两万多年，又经过了多少战争呢？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后世也不知道。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鬪的事实，然后才有那本兵书。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鬪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近来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个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无烟枪，我们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有书呢？还是先有书然后才有事实呢？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战始。当时英国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的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兰搬到非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有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吃亏不少，便学土人伏地的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士回本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传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理都采用它，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不是先有言论，才发生事实。」（「民权主义」第一讲）

第二、关于战术的革命：拿破仑说过：「没有十年不变的战术」。克劳塞维慈也说过：「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从历史上看：战术的变化，在专用徒手肉搏的时代，是「点的战术」，到了用戈矛弓矢的时代，便变为「线的战术」，再到用枪炮兵舰陆上海上的时代，又变为「平面战术」，泊乎现代，由于飞机的出现，使空中亦变为战场，更进化为「立体战术」。这不过是就其大概而言。至于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所变的只是解释及其应用方法，这又是不可不如。自然国父对于战术的认识，不是永久不变的论者，且以受到拿破翁克氏理论的影响，所以他说：「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鬪舰。现在外国的战鬪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至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舰。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鬪舰为最快，战鬪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鬪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军的战鬪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枪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像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革命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民权主义」第五讲）又说：「武器与战术固有关系者，以中国论，昔用之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军人精神教育」）可是战术的进化，固是跟着武器，而武器的进化又跟着什么呢？当然是科学。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之上的，不是政治哲理，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弹药，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那种科学就是十七八世纪以后，倍根、牛顿那些大学问家，所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民族主义」第四讲）

国父认为我国在现代战争中，应先讲战术，他说：「自海禁既开之后，与英战，与法战，与日战，与联军战，未有不败者，非无枪炮，

不谙战术故也。苟谙战术，则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国患之，南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军人精神教育」）但他却反对囫圇吞枣，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外国的战术，他说：「此次欧战发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弹，实不知其几万万也。在激烈战鬪时，每日所用，有至十数万发。然以其效力计之，则非万弹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战术，乃以子弹遮拦敌人，使不得前进，故多在二千米达以外用之。若在八千米达以外，至几万米达时，则须用重炮，亦如用步枪然，多在以子弹遮拦敌人之前进。此外空中以飞机战，水底以潜艇战，类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与闭天地洞，为炮弹所不能及者，两方兵士相遇，则以徒手搏击，甚至开战时，阒若无人，不知其战鬪地点，在于何处者。推其所耗子弹极多，以吨数计，总在几千几百吨以上（每吨合中国一十六担八）。此种战术，中国决不能学，因彼之制造子弹有加无已，且发弹系以机械，不费人力。现有最新式机关枪，一分钟可发一千五百颗子弹者，以一百颗为一盒，计算每一分钟可发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务在多发子弹，堵截敌人而已。」（同）惟在革命战争中的战术应探取攻击或防守呢？今日我根据追随国父的老同志说：国父的战术是以采取攻击为主的（注二），并且我们根据他如下的电令亦可以看出来：

其一、电令许某：「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矣。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苞，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击省城之敌（指陈炯明逆军——浴日注）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其二、电令胡汉民传令永丰舰长：「现杨总司令令希闵亲率滇军由龙岗出击淡水平山之敌，该舰长搜击海上偷渡之敌，毋使漏网。并相机与杨总司令联络，协同动作。若无线电不通，着盐运使派安北舰传令，并助永丰击敌。」

其三、电令虎门廖司令湘芸：「我追击军大破残敌于石滩之东，现已占据福田石龙之线，残敌向惠州溃退，虎门各部，着速出击，以扫荡石龙南东之残敌为要。」

于此。我们要明白的，战术攻击固配合战略攻势，亦可配合战略守势。但是在现代战争上，倘若被迫而取战略守势，战术亦以防守为主，死守阵地的挨打主义，这样，牺牲固重大，更无从战胜敌人，势必为敌人所迂回包围或中央突破，而招来全军的覆没。古兵法说：「以攻为守，乃自保也。以守为守，乃自毙也。」正是此意。故为击退敌人，歼灭敌

人，战胜敌人，必须采取攻击主义，对敌实行前攻，后攻，左攻，右攻，或袭击，扰击，诱击，伏击，截击，侧击，尾击，追击，亦即放弃「以静制动」的战术原则，政取「以动制动」的战术原则，方可获胜。

又，国父在战术上最喜用「奇兵」（有时亦包括战略）他说过：「用兵忌攻坚，尤贵出奇。」（「致石青阳与黄复生从速图陕电」）这走采用我国古代兵家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民十二东江之役，电朱培德许某等指示说：「望显丞抽一劲旅抄敌人后路为要。」电刘某指示说：「望兄能调一队至白沙堆，一以绝敌人后路，二可保我航线，闻敌人食粮辎重，皆在风门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夺之，则博围可解，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图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秘密」为要件，能如是，才可以出敌意表，博得辉煌的战果。

此外国父在战术上（亦即以攻击为主）尚有两大贡献如下：

一、游勇战术：此种战术，即现今所谓游击战术，国父于进行推翻满清时，即用此种战术。国父对于安南之黑旗用以抗法及南非洲杜国之农民用以抗英的游勇战术，素有研究，当民国十一年兴师北伐，驻节桂林，曾召集各军将校讲演「军人精神教育」，谓「此种战术颇适用于中国，若以北方交战，尤为相宜。」根着举出此种战术的五种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并作如下的说明：

何谓能命中？军队之有无战鬪力，以能杀敌与否为断，故命中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论，即外国军队，亦未必擅长。……若游勇战术，则与之相反，彼视子弹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轻施放，而有五十颗子弹，便已十分满足。以现在军队论，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颗以上子弹，何以一言北伐，犹以为少，岂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诸君须知子弹之接济与补充，有在后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视子弹，因其子弹，只有此数。非遇敌人，则无补充之机会，故不在后方接济，而在取诸前方，此不独游勇为然，即如粤军自援闽以至回粤，其子弹皆取自敌人为多，而不专恃后方接济，其明征也。若在无枪炮而用弓箭之时代，射箭比放枪更难，而古时有百步穿杨者，即在能命中，否则临阵之际，最多随带三四十枝箭矢，若无命中能力，即不啻无的放矢，只须数分钟间，矢尽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战？枪炮亦然，不能命中者，则子弹之消耗多，而杀敌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坛之战，段祺瑞军队耗去三百万子弹，而张勋之兵死伤，合计不过一百七十余人，此则由于不能命中之故。由是

观之，子弹之有效，在能命中，不能命中者，子弹虽多，皆为废物。近时兵士，往往轻于放枪，不问命中与否，放枪时，甚有高抬两手，或紧闭眼睛者，此何异于无的而发矢！须如子弹最为宝贵，中国既无若干大兵工厂，不宜学欧洲战术，以子弹为遮障，宜学游勇战术，视子弹如生命。但平时须练习射击，务求合中，不使虚发，此为军人之勇，有恃无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谓能隐伏？即避弹方法，但此种避弹，非如义和团之用符咒，乃系利用地形，为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时，常以此询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颇大，敌人一望即知，故须借地形以为埋伏之所，或藏在石头后，仅露其首，以便靶子缩小，敌人无标的可寻，我尚可从容窥探其举动。即在子弹如雨之际，尤宜深自闭藏，勿庸惊窜，因此时前后左右，必无敌人踪迹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盖得诸经验，而与操典中所谓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故隐伏亦为技能之一。

何谓能耐劳？此与隐伏相关联者，我亦问诸游勇，彼谓：「隐伏秘诀，只是「不动」二字，至少须耐十二小时之劳，直至夜深，始可潜行。因子弹之速力，异常快捷，人虽有追风之绝足，必不能过于子弹，走避易为所中，不如耐心隐伏，较为安全也。」此外尚有实例可讲，前此黄克强在钦廉起事时，有一次仅剩四人，逃在山上，敌之围攻者，约六百余人，然彼实不知仅有四人也。来攻时，皆用二一十人为前锋，而此四人者，如何抵御？据其事后所述：敌人未来时则隐伏不动，俟彼来袭，在五十步左右，始行开枪。每开一排，必死敌二三人，连开三四排，敌人之死者十余人，卒以脱险。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隐伏与耐劳之技能，否则以四人敌六百人，宁有幸事耶！

何谓能走路？现时中国尚未有完全铁道，行军之际，专恃走路。练习之法力，须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后，每日递加五里，如此则不觉劳顿，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战术，亦即以善走称。尚有实例可征，北军一到南方，每以山岭崎岖为苦，南军则如履平地，快捷异常，是为我之所长，敌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为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何谓能吃粗？游勇所恃之粮食，即此炒米一种，每人携十筋，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饥，遇有作战时，且无须费造饭时间，此亦为游勇之特长，胜于正式军队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占据地方不少，卒因

后路补充缺乏，乃至于败。粮食亦为补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粗，则于行军极为简便，既免飞藿挽粟之苦，而给养亦不患烦难也。

以上五种技能，是国父在距今刚刚三十年前所说的。较之今日游击战上所用的技能，虽很简略，仍可作为今日活跃于大陆上游击队之用。今日我们应加紧发展大陆上有枪或无枪的游击队。

二、非常战术：这种战术，亦称革命战术，系主张「用我军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去打破敌军十万人。」甚至「用一个人打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本来寻常战术，都是主张以优势的军队对劣势的军队，或以相等的军队而战，至低限度亦不过以二对三的军队相战，像兵学天才家克劳塞维慈在他战争论上，也是强调「兵数的优势为战略上第一原则」，战略如此，战术亦如此。其论拿破仑的作战说：「拿破仑常以大会战制胜，他是近代绝无仅有的名将，除一二会战未能以多兵制敌，不得不用超绝智力而取胜之外，他都以集中较敌优势的兵力或稍稍劣势兵力为常法。」可见国父的战术思想，比普通兵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为进步，他日我们反攻大陆必须发扬国父这一种战略战术思想。今日所谓「以寡击众」亦应作如是观。国父说：「什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地方，小而言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至少也能够打十个人。大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可以打破敌人十万人。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军人，才叫做革命军。……现在广东有十多万兵，都不能说是革命军。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去打一个人的。如果我军一万人遇到敌人一万人，才敢去对阵，若是遇到了两万敌人，便不敢前进。像这样的军队，有什么用呢？怎么可以说是革命军呢？至于本大元帅今天所谓的革命军，是一千人能够敌一万人，像有这样大力量的军队，在诸位军事家看起来，或者以为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寻常的军事经验讲，我军无论练得如何精良，总要用几倍人去打敌人，才可以操胜算。譬如用三万人去打一万人，才可以说是把握。如果敌人有三万人，我军只有二万人，便不能说是把握，至于敌人有一万人，我军也只要一万人，更不能说是把握。像这样的军队，是寻常军，不是非常的革命军。世界上有非常的时机，能够做非常的事业，便要有非常的革命军，才可以成功。诸位将士不信，只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历史，革命党和清兵奋鬪，没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敌百，用一个革命军打一百个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

革命党。诸位将士是湘军，是从湖南来的，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文强。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争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人，像这样的战鬪，是非常的战鬪，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所以本大元帅要大家以后能够打胜仗，做非常的事，便要变成非常的革命军。像黄克强那次在钦廉打仗一样，如果不然，就是枪好弹多，还是送把敌人，自己没有用处。」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讲词）再说：「现在的军队不是革命军，只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广州起义的军队，才可以说是革命军，当他们起义的时候，在广州的清军，有满洲的驻防军，有李准的水师，张鸣岐的陆师，总计算起来，不下五六万人，革命军的人数不过二三百人，那里有今日这样多的军队呢？当时的武器不过是手枪炸弹，那里有今日这样好的长枪大炮呢？那样少的人数，只用手枪炮弹，一经发动，便攻进水师各行台和总督衙门，后来因为约定的外援，没有赶到，便完全失败，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黄花岗。所以黄花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天打死了的革命军，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称为革命军。假如当时我们的革命军有三千人，或者敌人只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当时广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万人，我们的革命军方又没有三千人，只有三百人，众寡太相悬殊，所以结果归于失败。至于以战论战，当时城内之战，可算是成功。」（「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讲词）再又说：「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是说：「十则围之，倍则攻之。」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常的战术。……辛亥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发难，城外炮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都衙门，敢走瑞征，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军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人打五百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小数的人，打极多数的人。

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鬪，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鬪，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海陆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留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智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仔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穷脉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出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智识的军人，以为用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种道理，便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是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股晖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于此可见国父在用兵上是重质不重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军队个个都有「为革命主义去牺牲」的攻击精神（武器为次要条件），像这样的革命军，「以一当十」，自可杀敌致果。这是有战例证，并非夸大之谈，观于上述，便可了然。何况革命军对敌作战，胜固战，败亦战，从屡败屡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倘若当我一千人与一万的敌人相遇，或一千人与一千的敌人相遇，便心寒胆散，甚至弃械逃遁，像这样的军队，根本不配作战，更谈不上参加革命战争。所以我们今后在练兵上，尤其为反攻大陆，更应训练每一个士兵都有为主义而奋鬪牺牲的「以一当十」的攻击精神，那么就更容易取胜了。又从我古代兵学上来看，像孙子兵法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或「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或「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些原则，当然可以达成「非常战术」。再从现代战争来看，虽说战略以寡击众，战术仍要以众击寡。

但在战鬪上以寡击众而获胜的亦不少，要在如何运用而已。更可见「非常战术」的正确。

德国哥尔兹将军说：「关于战略战术，从事著作者，无论何人，非其所述原则中考虑本国特别事情，提供吾人以国民的战略战术，则不能谓之真有所贡献于国家。」真的，中国今后的战略战术是不能再徒事抄袭了，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国父的战略战术是最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我们今后应加以发扬光大。

（注一）见英国福尔区着「现代战争论」。

（注二）据李仙根、赵超先生等口述。